

重点阅读

胡学文长篇小说《红月亮》——

在呈现与遮蔽中行走

□杪 枏

如果只从故事或情节上把握胡学文的长篇小说《红月亮》,将是莫大的偏见。在以传统现实主义为训练场培养起来的社会阅读背景下,作者选择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是需要勇气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他对于文学秘境的执著探寻。事实上,小说的创作一直是在呈现与遮蔽的矛盾中进行的,作者会通过文本告诉读者一些什么,而这些呈现的东西更多地体现着作者所坚持的一种写作伦理,它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而如何实现这种呈现,则是体现技巧的地方。矛盾的地方是,作者所进行的呈现往往要通过遮蔽的形式来实现,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欲说还休,那种文本对内容的百般刁难,才是唤起读者审美的地方。基于这种叙事追求,胡学文的《红月亮》再一次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内容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了叙事的形式,我们才是在谈论艺术。

《红月亮》讲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它们之间甚至没有必然的关联。夏冬妮的父亲受冤而死,母亲发誓要为父亲洗冤,然而却走到了一条不被人理解的路上。夏冬妮跳河救人,她的照片被记者登上了报纸,但却遭遇了母亲的痛斥。这些变故让夏冬妮患上了撒谎恐惧症,即她不能说谎,一说谎就会有强烈的情绪和身体反应。她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改变自己,包括请心理医生治疗,但是症状反而越来越重。生活中的人出于某种原因让她做一些不真实的话,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她成了众人眼中的异类。丈夫杨开顺携公司的巨款消失了,一个离婚的男人毛安出现,夏冬妮在汪洋中看到了一根稻草。而事实是,毛安虚构了他的身世,也虚构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毛安歇斯底里地蹲在窗台上表演,夏冬妮的胳膊勇敢地向前推了出去。而在另一个故事中,记者赵潇潇在书中搜索新闻线索,不卖盗版书的书店老板马丁引起了她的关注。马丁的身世坎坷,一个叫秃头的人似乎握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秃头以次要快,想从他以及他的妹妹那里得到好处。书店的店员与马丁相好,但马丁面对威胁只能将她拱手相让。马丁的目标是摆脱秃头,而他将希望寄托于赵潇潇身上……

纵然作者的故事讲得酣畅淋漓、有声有色,或者讲得凄婉而迷茫,但是他无法改变故事不是小说最主要的内核的事实。《红月亮》在章节的安排上既已显示出与众不同,采用了写夏冬妮的《红月亮》、写马丁的《蓝云朵》和记录某种有毒草药药性的《药典》三个标题循环往复的模式;《红月亮》标题之下的标注则采取采访的方式试图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况且采访地点位于“××女子监狱”,此即指出主人公夏冬妮已经



入狱服刑,她入狱的原因不是她不能说谎,而是她识破了毛安的骗局之后将他推下了楼。我们是否可以想深一步,是真实、坦诚将伪善推下了楼?假如做这样的设想,则小说的寓言性大大增强,一个不能说谎的人,终究以身陷囹圄的方式求得真相。而《药典》章中记载的兼具良药功效的不同毒草药是一种阴沉的暗喻,情欲有毒,世俗的道德可以是毒物,真诚或者真相似乎也可以有毒,这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想法:毒与不毒,只看用在何处。马丁有向善的想法,但是现实对他的反制逼迫他只能铤而走险,好在还有感情能够给他的一线生机。将这些碎片编织在一起,我看到了很多按照正常单线条叙事所不具有的张力。透过小说,可以知道作者对生活的感觉很复杂,因此他选择多重的叙事手法以准确表现自己的感觉,丰满的语言质感占据着阅读的全过程。

小说的创作事实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素材、选择背景、选择视角、选择语词等等诸如此类。《红月亮》的选择实际上同时还是一个舍弃的过程,舍弃了那些上述呈现和遮蔽都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作者的难处;与呈现不一致的东西就是遮蔽,选择呈现必然要回避遮蔽,选择遮蔽必然要回避呈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功力让作品出现了矛盾互方面“双峰并峙”的局面,毛安作为夏冬妮的反面出现,要呈现毛安的恶,作者没有选择回避夏冬妮的诚实与善良,没有选择此消彼长,而是

让二者在相互角力中逐渐叠加,最终达到了“红”、“蓝”、“毒”三者成为互相牵制的局面。由这三个字,我忽然想到了军事演习中的角色,我们是否可以再做一种可能的想象:红方的主帅是夏冬妮,蓝方是马丁,毛安则是一种为了一己之私、不停地背叛自己所属阵营、哪一方都视其为叛徒的毒物。《红月亮》或许就是展开一场预设的纸上演习,这场演习不是史诗性的战争,它只是在推演现实中一些细碎的观念发生碰撞的可能性。

《红月亮》中的人物众多,但他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在自己所占的位置讲述自己的角色。这种角色划分体现着作者的主体性,在纷繁的、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背景下,选择这样一些符号化的人物,阐释着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表达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西方一直存在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灭亡”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的观点,目下我们的时代也不再是那种单一的价值观念所主宰的时代。《红月亮》将现实中矛盾各方的共生性存在再次预示为征服性的对立,表达的其实不是现实的可能性,而是作者内心里的朴素愿望。没有人希望杂乱,但是现实又不简单。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小说张力的源泉,而这种张力常常是通过人物来实现的。我始终不能忘怀夏冬妮说谎时的窘状,那似乎是每一个善良、正直、简单的人都会面临的尴尬。这样的性格塑造反映了夏冬妮的身份定位,即这个形象是一个反讽性的人物,她在面对其他大多数人时表现出了愚钝的一面,即当大家都说谎时,她却不能。她的悲剧表现的是人性的悲壮,但是同时又是人生的悲剧。我们看到在时代的大路上,世俗的卡车载着顺从它的人,却从坚守理想的人身上碾过。望着卡车载着人、轧着人绝尘而去的背影,我们的心五味杂陈。

帕慕克说过:“灵魂,是小说家努力毕生想传达的一种特质。只有当我们能够将这个奇怪而令人迷惑的任务归入适当的范围时,人生才会幸福。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都不是源自生活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在我看来,灵魂这东西,只能在小说里找到。”作者在《红月亮》里赋予那些人物的一举一动不同于文本表面的意义,是因为他深信,生活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的表面上的差异性,并不能够代表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是那些人的灵魂。人贵有灵,无论恶的还是善的,无论高贵的还是卑贱的。他们的意义,是我们赋予的,而不是生活本身赋予的,一如《红月亮》里的这些人,这些事。

《红月亮》,胡学文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新知新思

高丽君是近年来从宁夏西海固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她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创作的精神突围,以饱满的激情、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坚定地捍卫散文尊严。她以低处的人生历练,向高处的诗意人生靠近,她的文字真实、安静、清透,文采盎然。读高丽君的散文集《在低处在云端》,从中可以看出她在这样的一个消费和欲望蓬勃的时代,坚守文学的诚意和建构精神主体的不懈努力。

纵观高丽君的散文,从大的方面我大致把它归为两大类,即低处的日常生活书写和高处的精神诗意书写。对于家园和日常生活,在高丽君的笔下,人间的烟火气息很浓。我深信,一个人少年的记忆,会影响人一生的生活,甚至人生的命运。正因为作者在少女时代亲历了家庭生活的困苦、目睹了乡村生活的艰辛,以至于在她走出乡村、定居固原山城多年以后,对乡村的苦难生活与苦难岁月仍有清晰的记忆,许多生命里的细节,就在情不自禁中以一种疼痛的方式裸露出来,但这裸露不是梦游或梦呓式的,而是自觉的切近生命细部的。也正正是因为有了苦难的生存体验,让她格外懂得珍惜亲情、珍爱生活。如,可以当小说来读的长篇散文《1983:一段断壁残垣》,读后让我想到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想到了《我的梦,我的青春》里的少年郁达夫。“我的1983,一段青涩苦味的时光,以成长的名义,覆盖着一年的喜怒哀乐。那些人,那些事,最后都散成千百万片落叶隐退在时光之后,不成章节,不成篇帙,零碎得只能算是短短一阙小词,……”以一个成年女性的视角来观照一个十二三岁女孩子眼中的1983,往事并不如烟,往事又不堪回首。在《秋风穿过老戏台》里作者写道:“一场场秋风吹过,年华也被吹到暮气苍茫。村庄里,灰色的柴草和灰色的戏台,像是一对携手告别夕阳的伴侣,一起告别了夕阳的辉煌灿烂,只留下曾经的美丽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追求着热闹,把生活变成一个巨大的豪华戏台,精彩的呈现,高高的矗立,在这里互相攀比,争相展示,打扮自己、装点子女;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只是,演技变得既纯熟又拙劣;技巧纯熟,性质却失真、失真了很多,远不如旧戏台,古朴、陈旧中却裸露着的真诚和坦荡。”作者虽然离开乡村多年,但对乡村的关注并没有因自己的离开而减少,对那片生她养她的故土,她的感受是凌厉而尖锐的。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的变迁,她的感受是敏锐的,西北乡村严酷的生存现实在她笔下有着深切的自感。因此,她的乡土散文书写就避免了伪乡土叙事的假象,直面乡土的真实,写就了诗意的乡土丢失了的疼痛。那些年代和那个年代的村庄早已消失了,但那些年月的疼痛,依然烙在她的心底,就像长年累月风吹雨淋的乡土生活留下的老病,那病根会在天气变化时反复发作。《天

低处的人生 高处云朵

□赵炳鑫



边飘过老庄的云》《迷失的乡村》等篇章,都在直面这样的疼痛,读后启人沉思。

当然,最能标示高丽君散文创作高度的还是她那些富于诗情的文化散文,读后给人以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这也是我最看重的。如在《低头一梦舞霓裳》中,作者以灵动之笔观照一代才子薛涛的生死命运和爱恨情怨,写出了一个远逝灵魂的苍凉与孤独,行文节制,字字珠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的惺惺相惜之情。《唐雪遥遥飘,诗心渺渺来》一文,用典故切切,辞藻华丽,表意深邃。作者发思古之幽情,叹人情之冷暖,锦心秀口,深情无限。在风格上有易安之质,清新隽永,情趣盎然。作者穿越千年的大唐烟雨,写就了一段飞飘千载的雪花所带给尘世的千年覆盖。大唐诗杰几近涉猎,恭书短引一气呵成。写就了英雄

豪气,又写就了儿女情长,行文显得苍凉壮阔、得意孤绝。读者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愉悦中,感受散文的诗性之美。

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可能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答案,虽说如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能吸引人、打动人的散文一定是好散文。评论家雷达曾说:“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在这里,对散文创作主体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散文的成长过程需要多种元素的滋养才能完成,但最重要的是思想和情感元素。思想情感是作家的一种感悟、一种发现,更是作家人格魅力的表征。散文如果丢失了它们,就会苍白虚浮,构建不起散文生命的质感,当然就更难以成为好的散文。高丽君的阅读是广泛的,她的视界比较开阔,同时她又有对文学的挚爱和激情。记得有人说过,能为自己的所爱全身心地痴迷进去,是一个人生存质量的顶峰。高丽君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排除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所爱,因此,她活得充实而丰富,活出了生命的质量。从她目前创作的势头,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超越。

《在低处在云端》,高丽君著,阳光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开卷絮语

做一个温柔的父亲,最美

□王永洪

2010年6月,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的代表作《我亲爱的甜橙树》中文版上市,当时我的孩子也是5岁,正是与书中主人公小泽泽相同的年龄。事实上,在编辑稿件的过程中,我就时不时地把自己与书中的两位父亲——泽泽的亲父亲和心目中的父亲老葡作着对照,反思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有误解孩子的行为,是不是有粗暴的行为,是不是有伤害孩子心理的行为……泽泽亲父亲父亲的粗暴行为似乎在告诉我:不能这样对待孩子;老葡的耐心与温柔则成为我的榜样:好父亲应该是这样的。

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是巴西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的一生命运坎坷,有11个兄弟姐妹,从小在伯伯家长大,当过渔夫、教师、模特、舞蹈演员、侍应生、电影电视及话剧演员,曾到欧洲和巴西各地旅行。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情景许多都来自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我亲爱的甜橙树》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泽泽”其实有着很多作家自身的影子,但作品内容和主题又超越了作家个人经历的局限,有了普适性。书中作者的创作谈更让我记忆深刻:“写作是我找到的用以展现我的生活经历、传递我的喜怒哀乐和一种久被遗忘的感情——温柔——的方式。没有温柔的生活毫无意义。”

根据自己平时的了解,随着我国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成为父母,市场上的家教类图书也是风生水起,但其中大多是“育儿100招”之类的技术指导类图书,或者是一些父母讲述育儿经历的“成功学”,有不少甚至宣扬“孝心地打孩子”。作为一个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观念的国家,“温柔”实在是非常稀缺的,许多家长从没有品尝过“温柔”的滋味,自然也很难让自己的孩子体验到“温柔”之情。每每从新闻中看到某地家长打

伤甚至打死孩子、或是某地老师体罚学生的消息,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沉重。《我亲爱的甜橙树》中那些感人的情节以及作家的创作谈,让我的心里似乎有了一种亮光,意识到应该把这本书介绍给更多的家长、更多的老师,让大人们多多地感受一个孩子的真实心理,让“温柔”之情在我们的家庭、学校中更多地广泛地传播开来。

然而,在一个缺乏“温柔”基础的国家推广“温柔”显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我们尝试着从三个方向进行推广。其一,《我亲爱的甜橙树》是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因此,我首先与儿童文学专家联系,得到了王泉根、汤锐、梅子涵、周晓波、朱自强的支持,他们对该书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其二,《我亲爱的甜橙树》中对儿童心理的精准把握,使我想到了中国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重镇——北京师范大学。经过多次的交流,北师大的向蓓莉老师撰写了《温柔需要经济条件》一文,使《我亲爱的甜橙树》超越了“儿童文学”的范畴,具有了更深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其三,《我亲爱的甜橙树》中以5岁男孩泽泽的内心独白为主,显然这是一个很适合“亲子共读”的文本。我们与亲子网站、儿童阅读推广人等进行了密切的沟通,使该书在亲子阅读的读者群中有了更大的影响。

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从韩国引进了《我亲爱的甜橙树》漫画版。这是韩国画家韩孝英根据原著改编的作品,内容上保持了完整故事情节,构图上夸张幽默,有很强的韩国画风,对原著的精神表现得充分。浅易的文字和夸张幽默的画风吸引了识字不多的低幼读者,填补了纯文字版图书的不足。

2013年,《我亲爱的甜橙树》续集《让我们温暖太阳》又与读者见面了。在续集中,11岁的泽泽已经被富有的医生父亲领养,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富裕的家庭却没有带给他渴望的“温柔”,严厉的父亲和每天催促泽泽练钢琴的母亲,使泽泽幻想出了一只住在心里的哈蟆亚当,而一个银幕上的演员莫里斯成为了他理想中的父亲。“我想有一个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晚安的爸爸,一个用手抚摸我的头的爸爸。”因此,我们希望借助不同的媒介,让中国的孩子都拥有一个“温柔”的父亲,让“温柔”一词成为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用语。

《我亲爱的甜橙树2:让我们温暖太阳》,[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著,蔚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文学叙事中的简单形态与复调架构

——读老九的《卖书记》

□王建旗

的逻辑性。在这种荒谬和逻辑之间我们都无能为力。

沿着《卖书记》在表意上提供的线索,读者会觉得主人公既是一个丧失或交出了自己所守护的东西的“失败者”,同时又是一个在守护自己的过程中一再把自己的“理由”腾空(或输掉),并不断放逐(或被放逐)新“理由”的“觉悟者”。他只是无奈、妥协、痛苦,但不是愤怒;虽然有一点软磨硬抗,但没有彻底拒绝。我觉得,这一点正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是用这种似是而非、明扬暗抑的表述来揭示一个人、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巨大的生活潮流当中的无奈与失措。我们仅是卖书这么困难吗?其实在这个卖书的过程中,主人公所处的境况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生活境况——被社会、生活、时代、时尚、习惯的洪流所携裹,除了与它们一起前行,一起被动或自愿地前行,谁都没有抽身它事的可能性,于是大家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成为一个参与者,一个不断地把自己“供出来”的同谋。

然而,这并不是《卖书记》所要掩藏的谜底,含有“谜底”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作者卖书的痛苦和隐衷,因为被卖的书籍是一个隐喻,它能指范围包含了可以与坚硬的生活逻辑和物质世界相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柔软、自由、敏感、自在的内心世界,作者的痛苦正是因为不得不再背离“内心世界”的律条而产生。有意思的是,在《卖书记》里这个作为“对应存在”的内心世界却一点都没有被提及,你几乎找不到它一丝一毫的影子,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在阅读中感到自己和作者一再被这个看不见的、引而不发的世界影响着。很显然,《卖书记》旨在把一个虚张声势、真理在握的现实世界呈现出来的同时,却把另一个不声不响、不现身、不在场的内心世界隐藏了。而恰恰是这个“有理”的世界才有着更多的受质疑、遭控诉、被反思的性质,《卖书记》的文学策略就是这样一种“举证”和“出卖”,用我们正在遵循的规则“祭奠”我们曾经放弃的信念,而且为了把这个由生活的逻辑支撑的现实世界完全推上“被告席”,作者把自己也毫不怜惜地放到了“祭坛”上。

当然,现实存在与内心世界是以二律背反的内在程式互相依存的,它们有着更多的藕断丝连和互为依托,像两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谁也不能非此即彼,完全倒向其中任何一方。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现实和趋利避害的取舍当中,受伤害、被遮蔽的却往往是我们心灵的那一面。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偏袒和声援它,让它充分释

放。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用自身的“菲薄”来认识内心——其结果必然是这一再被稀释的内心世界只能草率地向不断被强化的现实世界“让路”。所以,作家的工作有时候就是为心灵去开辟“场地”,制造“甲壳”,我相信软弱的灯芯般闪烁不定的心灵,一定有着让任何“场地”和“甲壳”都无法盛下的光亮。这正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实世界最为缺少的东西。

有了可以互相指涉和平衡的两个世界做背景,即便主人公被逼到最后的角落,也依然有翻盘的机会和退却的余地,这使《卖书记》成为一篇不仅是生活在别处,而且心灵也在别处的作品。有一个潜在的内心世界作支撑,使作者的叙述空间加大了,回旋的余地开阔了,同时使叙述也显得不温不火,游刃有余,表现出极大的耐力、隐忍与节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输得起”。比如故事里的主人公虽然有个《套中人》的嫌疑,但他的内心早已不在圈套之内;比如作品的主题在很大成分上极像《迷惘》,但是主人公根本不用像基恩那样去做最后的反抗,以毁掉自己的生活 and 世界。因为他根本就不用这样,他向生活缴械本身就是返回另一个世界的一种途径。我们只能说《卖书记》的主人公是个胜利者,虽然他是个耽于败绩的胜利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作家老九的叙述语言,它们充斥着诙谐、反讽、戏谑、黑色幽默……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卡夫卡、卡维诺斯、博尔赫斯、马尔库斯。我觉得,其主题应该是现代主义式的,其方法又含有后现代的诸多成分,或者它们本来就是混淆在一起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复调”。复调的写作常常是一种反证(或互为反证),被坐实的不一定是真的,被隐藏的可能更具意义;它们不能互相指代,却可以在同一时空对流、交汇、川流不息。但是它们又难以汇总,求得逻辑的因果与得数,就是说这样的“写作”有时是一种与“得数”无关的运算——它不求得真正进入“城堡”,但却不可否认地是一个朝着“城堡”一再推进的不连贯的算式……作家老九把一个形状的不成形性质预留给每一个读者,为文本在“诠释学”意义上的“二次创作”留下了开放的空间。

茶香茶座